

清園論學集

王元化

清園謠學集



滬新登字 109 號

清園論學集

王元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7 印張 22,625 字數 463,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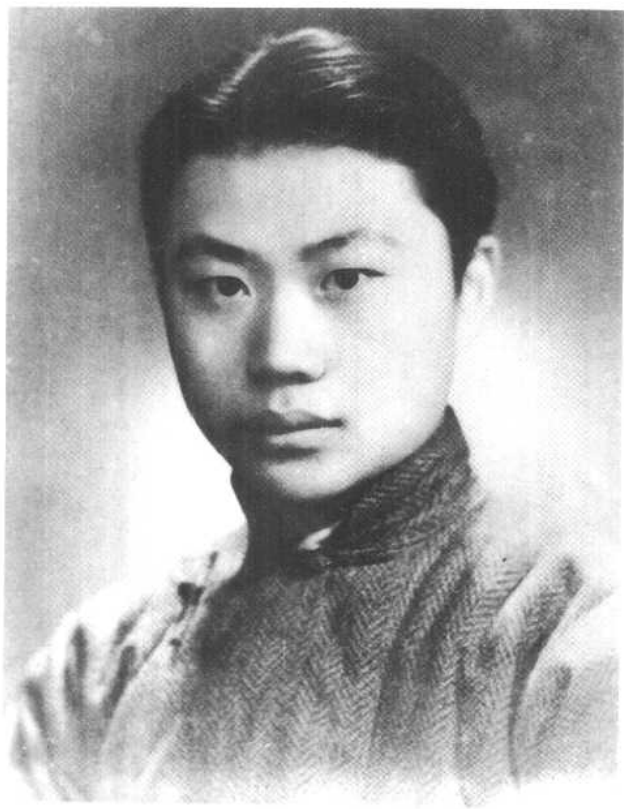
印數: 2,001—4,000

ISBN 7-5325-17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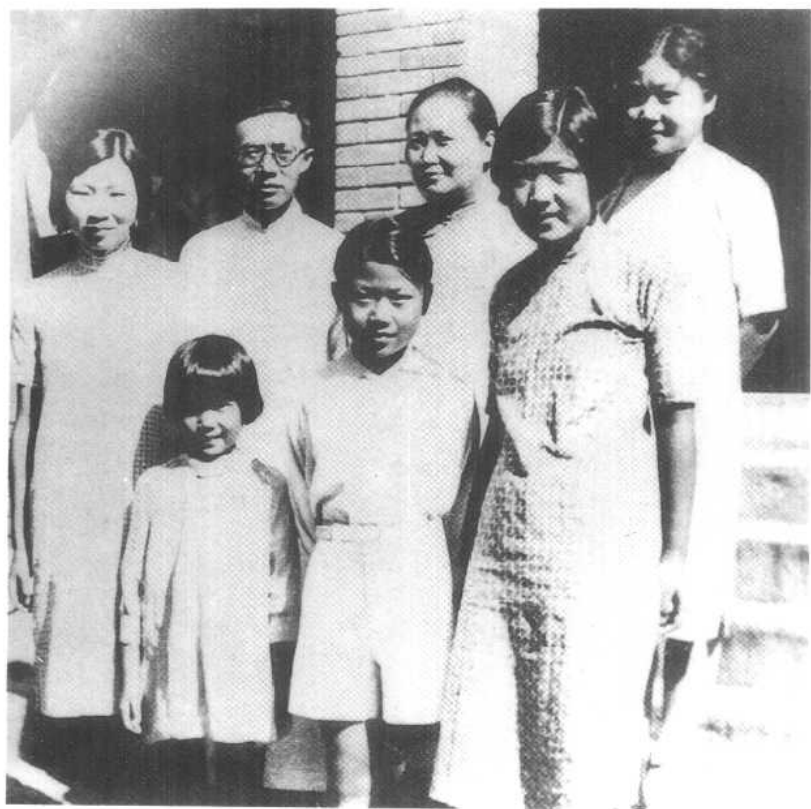
Z·259 定價: 43.60 元



一九九四年作者攝于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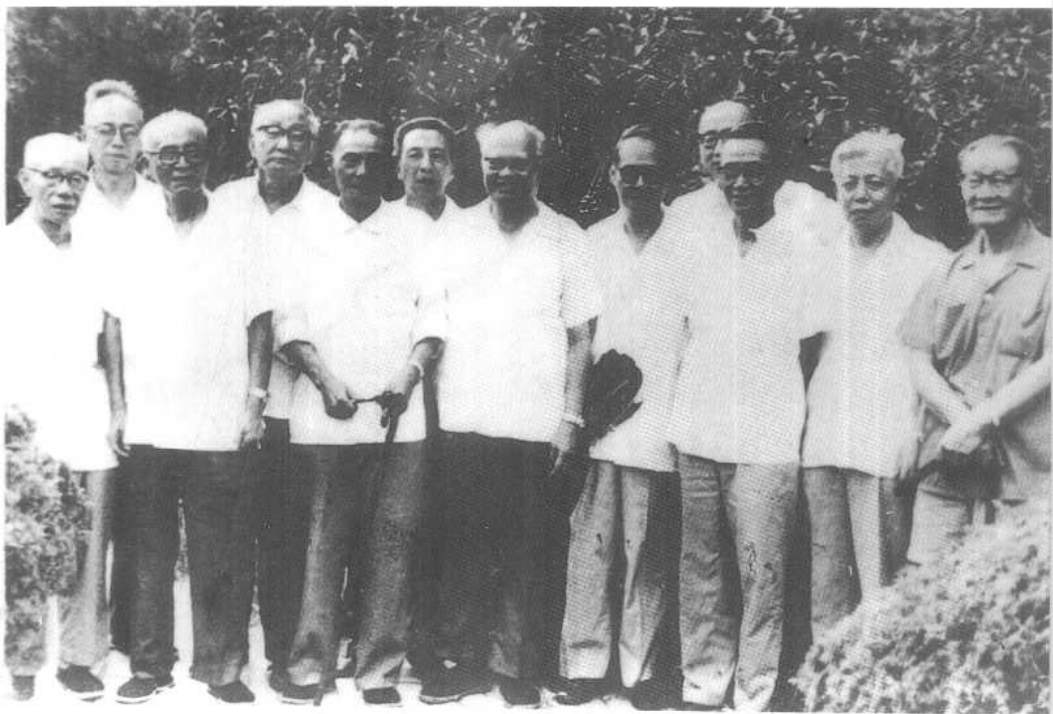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作者初到上海時攝



一九三一年作者全家攝于北平西觀音寺寓所



一九九三年作者與夫人張可攝于滬上寓所



一九八一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文學評議組成員攝于北京京西賓館(自左至右:呂叔湘、李榮、朱東潤、吳世昌、蕭滌非、夏鼐、王力、錢鍾書、王起、王元化、王瑤、鍾敬文)

亦假可喻于青松，出世速如人遐，今懷雅制，盡昭哲賞，屈賦之志。
 之青，浩浩流，予別之，姜姜春草，用班姬風，為團圓唱，興公天生。
 之台，致之景，賦純叙瀑，思而擅場，彥伯東征，之流風，至若雲橫廣。
 莫及，月照積雪，吳亦不限，于池塘，親山川，並自昔，物色，故所。
 調，延無故物，王恭以為佳言，思君若流水，宋帝府有其音。
 出月露之形，知叙事，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爭奇一字，競不。
 巧，錯一韻，然後成，為秀哉，蓋聞玉藻，瓊敷，等中原之有。
 寂，錯金鏤，采真美，藻之出波，隱秀，之篇，可以自然求。

序

學不干時身更貴，
書期供用老彌勤。

——錄汪公嚴詩句

我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寫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認真算起來，我從事研究和寫作的時間并不多。生活環境的變化也使我有好幾次不得不放下筆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一九四九年，我只寫了幾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到一九七九年末平反，在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機緣，我才鼓起勇氣記下當時的感受。我并不奢望這些文字將來可以發表，只是爲了排遣生活的空虛，想在流逝的歲月中留下一點痕迹。這期間我兩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災害時期，因營養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兩年，正是我寫作《文心雕龍創作論》進入高潮的時候，突然少年時期所患的靜脈周圍炎（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復發了。一天早上醒來，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見了。我對這意外的打擊感到恐懼。那時寫作

是我的唯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將怎麼辦。在這愁苦的日子裏，我的親人爲我找到上海最好的眼科醫生。我接受了醫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針。由于療效不大，剩下的一針就停止不打了。當我從消沉中漸漸振作起來，我還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請求父親幫助。那時他已八十出頭了，早已從北京交大退休回來，和母親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極大耐心爲我閱讀資料、作口述筆錄。現在我還保存着他爲我謄寫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剛剛有所好轉，持續十年之久的“文革”發生了。

我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青少年時期是在戰爭烽火中度過的，接踵而來的則是運動頻仍的嚴酷歲月。從事研究工作，需要擺脫世事的困擾，無拘無束地進行潛心思考。黑格爾于一八一八年榮膺柏林大學的講席，他一登上講臺就在開講詞中說：“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現實，太馳騁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內心，轉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現在現實潮流的重負已漸減輕，使得幾乎已經很消沉的哲學也許可以重新發出它的呼聲。”（大意）黑格爾說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種內心的寧靜，不是生活在動蕩環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艱難歲月也使人有可能將環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轉化爲平時所不容易獲得的洞察力。沒有經受這種痛苦，沒有經受環境施加給人的無從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產生這種深沉的思考。這是在遠離塵寰的書齋中通過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義者雅科布·伯麥（Jakob Böhme）把“苦悶”（Qual）作爲能動的本原就含有這種意思吧。爲什麼有不少人一旦離開養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

新生活中過着很少變化的寧靜日子，思想反而逐漸枯窘起來呢？恐怕那些曾經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應該把環境施加給我們的影響，作為我們喪失寧靜生活的某種補償，雖然這並不是我們所追求、所願意的。相反，我們却要為命運所作的這種安排付出重大的代價。

憂患意識長期以來促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升華。太史公所謂“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以說是對中國思想史所作的鉤玄提要的說明。我以為不能單單列舉五四時代那些把學術當成實現某種意圖工具的學人，作為維持“救亡壓啟蒙”這一觀點正確性的唯一依據。我們應該從他們的思想本身去找尋問題的答案，縱使當時沒有救亡的壓力，他們也不會做出其他的選擇。直到今天還有人把這一時期和他們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國維、陳寅恪等，看作只是一些從事純學術研究的冬烘學者，殊不知他們對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說的那些人遜色。他們以為學術而學術的觀點，宏揚傳統，重建中國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圖存的動機，但這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學術研究。

一位友人曾從我的書中摘出這樣一些句子：“人的尊嚴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識就愈會變得堅強起來。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靈的相契有時比觀點上的分歧更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東西。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他認為這些見解不是來源於讀書，而是直接來自閱歷。這話是不錯的。生活

經歷激發了思考。這些年我所寫的談龔自珍、談韓非、談公意、談道德理想主義、談杜亞泉，以及對於黑格爾、對於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樣情況下進行的理論探討。在歷史和現在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的“史家對已往史實的興趣永遠是和他對當前生活的興趣連成一體”這句話最為透徹。但它也包含了一條界限，史家一旦越出這條界限，把對當前生活的關懷變成用歷史去影射現在，那麼也就使歷史失去了它的獨立自主性。這種現代關懷是隱含在歷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覺的、無意識的。

我希望讀者從這本論學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歷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編第一本集子時，大部分就未收入。這些文字多半是抄襲蘇聯的理論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從這種模仿中掙扎出來，已是孤島時期結束以後。日僞直接統治下的上海成了一個恐怖世界，我的許多藏書都自行銷毀了，自然更談不到發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靜地思考。我對教條主義感到了厭倦。浸透着人文主義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紀文學，幾乎成了我當時的唯一讀物，引發了我的濃厚興趣。也許這是由于小時候在家庭受到宣揚鄰人愛的基督教義的影響，使我對這些文學作品產生一種認同感吧。抗戰初，我結識了滿濤，他剛從美國經歐洲返國。由于共同的愛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喜歡他的小說的沉鬱，也欣賞他的雜文的犀利。我們對魯迅精神作了自以為深刻其實不無偏差的理解，以為在論戰中愈是寫得刻骨鏤心、淋漓盡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緒對

于未經世事磨練、思想不够成熟、血氣方剛的青年來說，並不是什麼好的徵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風案件的株連，引發心靈上的大震蕩，接着陷入一場精神危機之中。在隔離審查的最後一年，我被允許閱讀書籍。這時我完全被黑格爾哲學所吸引。我認真地讀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邏輯》、《美學》、《哲學史演講錄》三種，成了我熟讀的書。僅僅《小邏輯》這部著作，我就讀過四次，每次不止讀一遍，寫了兩次筆記，共有十來本練習簿。我沈潛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過去那樣迷戀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這以後有許多年，我只讀那些不容易讀懂的書，以為只有這種著作才蘊含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時以艱深文淺陋的屬鼎之作，尚不像今天這樣彌漫于理論界，而我對它們也有了一定的識別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國古典哲學自康德以來所倡導的批判精神。這裏說的批判精神，就是對過去各個哲學範疇重新衡量與估價，也就是對那些未經過追究的範疇進行考核，探討這些範疇在什麼限度內具有價值與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經考察過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提倡獨立思考的意義。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者開啟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權威，不管這權威是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這種批判精神給予了我很大的影響。直到這兩年，當我對黑格爾哲學進行反思時，我還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習慣所形成的偏見和謬誤。這不僅限于對黑格爾本身的再認識，而且也是對五四以來在進化論思潮下所形成的新與舊、激進與保守、進步與反動等等既定觀念的重新估價。這些觀念

至今仍作為知人論事的標準，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歷史真象難以破除的偏見。

我感到，自己沒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對材料作出仔細的鑒別和考察，是造成誤差的原因之一。這就很自然地聯繫到傳統的訓詁考據問題上去。這方面的思考使我發覺，過去所深信的所謂邏輯和歷史一致性的說法其實只是理性主義的過分自信。在歷史的進程中雖然也可以發現某種規律性，但歷史和邏輯畢竟不是同一的。邏輯推理不能代替對歷史的實際考察，史家的史識必須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實證上。清人錢大昕說訓詁考據乃“義理所由出”，也就是闡明此義。可是長期以來，只有觀點才是最重要的這種看法始終占據上風，而訓詁考據則多遭藐視。據說一位論者準備批《四書》中的儒家思想，竟以為用不着去讀原著，只要請人把《四書》中的有關觀點羅列出來供他使用就行了。這可以作為上述那種看法的一個實際例子。不必諱言，過去不少訓詁考據文章，往往流于瑣碎，有的甚至變成了言不及義的文字遊戲。但不能因此斷言訓詁考據是無用的，正如不能因為曾出現過大量“假、大、空”的理論文章，就斷言觀點義理是無用的一樣。我不同意把觀點義理置于訓詁考據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這個問題不能抽象對待。對於莊稼來說，下雨好還是晴天好？要根據具體情況才能判定。對於研究工作來說，觀點重要還是考據重要？也屬於同類性質的問題。馬克思曾經嘲笑莎劇《科里奧蘭納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做他自己身體的一個斷片，由一個個體供給其他所有個體以營養。他認為各司不同職能的人是像

珊瑚一樣，每個個體都供給全體以養料。我覺得，學術工作所采取的各種研究手段，其作用雖有大小，但也應作同樣的理解。莊生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闡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這句話隱隱涵有平等與自由的意蘊，是值得細細玩味的。

本書是我歷年所寫學術論文的編年選集。我本來並沒有想到編這樣一本集子。大約五年前，北京師院出版社的兩位編輯來到我家，要我為她們的出版社編一本學術論文自選集，當時因為忙于別的事，未能應命。兩年以後，有了空暇，又想起這件事，覺得不妨一試，就開始清出已出的各集和能找得到的舊文，斷斷續續邊讀邊選，有時還順手作一些文字上的修訂。前前後後也有一年多，確實花費了不少力氣。現在此書得以問世，這是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和多次與我合作的責編王興康同志的。

作 者

一九九四年八月記于滬上清園

目 錄

序	1
金批《水滸傳》辨正(一九四零年)	1
談談十九世紀外國幾位文學家(一九四五年起)	16
關於《約翰·克利斯朵夫》	16
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	21
關於果戈理的幾句話	2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與契訶夫	29
別林斯基與果戈理	34
契訶夫和我們	41
莎士比亞評論譯文題記(一九六零年起)	49
泰納《莎士比亞論》譯文題記	49
威廉·席勒格《莎士比亞研究》譯文題記	52
赫茲列特《莎士比亞戲劇人物論序》譯文題記	55
蘭姆《關於莎士比亞悲劇上演問題》譯文題記	57
史密斯《莎士比亞評論集序》譯文題記	60